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融入音乐剧声乐教学的路径探究

马 娜

自西方音乐剧传入中国后,我国高校音乐剧声乐教学一直借鉴西方声乐教学体系,注重气息控制、发声技巧、音准节奏等方面的标准化训练,虽然有效提升了学生演唱的专业性,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民族风格缺失、音乐表现同质化等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原创音乐剧作品的演唱中,更不宜照搬西式演唱理念和技法,必须融入中国声乐文化元素,方能使作品得到更加精准、生动和深刻的诠释。对此,应正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将其全面融入音乐剧声乐教学中,推动教学模式由借鉴西方经验向立足本土创新转变,为中国音乐剧事业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确立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的创新和确立是教学活动实施的前提。因音乐剧是一门西方艺术,所以自其传入中国后,国内音乐剧声乐教学自然沿袭了西方声乐教学体系,并形成了偏西式的教学思维。西方声乐体系固然有其科学性和适用性的一面,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同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并且可以与西方声乐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近年来,伴随着诸多中国音乐剧作品的问世,若演绎民族化题材作品时依旧套用西方声乐的演唱技法与艺术风格,容易产生“不中不洋”的表达困境,更无法使作品的内涵得到准确和深刻的诠释。这对于中国音乐剧事业和学生的个人发展均是不利的。所以,需要学校和教师转变教学观念,认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对教学和学生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将其融入专业教学始终,让学生既能掌握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音乐剧演唱技巧,又具有扎实的民族声乐知识和素养,并善于在实践中将两者融会贯通。通过中西融合、取长补短、守正创新,保证教学改革深入持久地推进。

重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通俗地说就是“学什么”的问题,倡导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融入音乐剧声乐教学中,要从课程设置、内容优化和教材建设三个方面予以落实。首先是课程设置。可以在现有课程基础上,增设“中国传统声乐润腔技法”“民族声乐作品演唱赏析”等课程,系统讲解中国传统声乐的演唱理念、演唱技巧、演唱风格等,让学生对中国传统声乐特点和风格有初步的了解和把握。其次是内容优化。内容优化主要体现为在课堂教学中将两种声乐文化和技法精准融合。比如,在气息训练方面,学生除了要掌握西方声乐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外,还应主动对中国传统声乐气沉丹田、以气驭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学习。特别是以气驭声,主张在气沉丹田的基础上用可控的气息节奏带动情感表达,从而避免声情脱节,实现“气为情之基,情为气之魂”的效果。这正是对当下学生演唱缺少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精准补足。再次是教材建设。为保证两者持久和深入的融合,学校和教师应主动编写契合音乐剧声乐演唱的教材,重点梳理和呈现可以丰富和强化演唱的各类技法,搭配具体的演唱案例和训练要点,填补目前的教学资源空白。

创新教学方法

传统音乐剧声乐教学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虽然针对性强,但是学生往往缺少主动思考和实践的机会,使得教学效果受限。所以,在融入传统声乐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如中西对比教学法,教师可以选择类型和情绪相似的中西音乐剧作品,就某个唱段的演唱进行对比教学,并从气息控制、咬字吐字、情感表达、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剖析,让学生直观、清晰感受中西两种声乐演唱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树立起主动了解和学习传统声乐文化的意识。又如沉浸式实景教学法,学校应打破课堂和校园的空间限制,广泛邀请戏曲或民歌传承人等走进校园,开展专题讲座、示范教学等各类活动,依托他们多年的舞台经验,就各类演唱技巧予以直观和生动的展示,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声乐的价值和魅力。又如实践教学法,为了使学生学得的专项知识和技能得到有效巩固,学校和教师应鼓励学生全面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如中国音乐剧作品排练、西方音乐剧唱段的民族化演绎等,让学生学得的专项知识和技能有充分的发挥空间,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认同,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强化师资建设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引领者,其对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重视程度以及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将对融入的深度和成效起到决定性作用。当下某些音乐剧专业的教师对传统声乐文化缺少足够的了解,未能形成专项知识和技能体系。对此,一方面,需要学校系统化、常态化开展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专项培训,内容涵盖戏曲和民歌本体、演唱技巧、演唱风格等,同时邀请名家或传承人走进校园,以口传心授的形式帮助教师掌握专项技法,教师经过学习和消化后再将其与西式演唱对比融合,并全面应用于教学中。另一方面,针对现有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可以广泛聘请戏曲或民歌传承人、资深戏曲或民歌演唱者、原创音乐剧主要创演人员等进校园,深入参与到课堂教学、舞台实践等各项活动中,并从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视角对多个教学环节进行补充和丰富,形成协同育人的新格局。此外,学校还应鼓励教师对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与音乐剧声乐教学开展课题申报、剧目改编、教材编撰等一系列科研活动,并及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推动这项融合的长效化、科学化发展。

自我国高校开设音乐剧专业以来,先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剧人才,有力推动了这门艺术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伴随中国音乐剧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剧声乐演唱也要在理念、技巧和风格方面做出积极调整。在教学中全面融入中国传统声乐文化正是教学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两者的有机融合,既能够完善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可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中国音乐剧事业的民族化和可持续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本文系2025年北京舞蹈学院院级课题“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剧声乐教学中的体现及运用”(编号:0625052/050)研究成果]

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的中西交融

方香蕾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变革。新文化运动蓬勃推进,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与中华本土音乐文化开展广泛交流互鉴。在音乐领域,源自西方的艺术歌曲体裁经留学归国音乐家的探索实践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成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创作特征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在近代专业音乐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这批作品承载着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与时代思考。本文对该阶段艺术歌曲创作特征展开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音乐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脉络,也对当代音乐创作如何处理本土与外来音乐资源的关系提供一定参考。这既有助于我们厘清近代声乐体裁本土化转化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认识早期专业声乐创作在近代音乐文化建设中承载的文化使命,也为理解中国近代音乐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一个具体的观察切口。

在这一时期,萧友梅、赵元任等中国作曲家率先尝试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为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将欧洲近代作曲技法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学意蕴、本土音乐音韵特质相结合,展现作曲家自身的情感诉求。之后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创作模式。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历经近百年历史淘洗,直到今天仍广受大众喜爱,自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从当时的音乐技法融合角度看,这批作品在旋律、和声、曲式结构等维度积极开展中西融合探索;在文化表达层面,既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融入了西方音乐的表现手法,能够反映当时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音乐家的创作思路与追求;在历史价值层面,这些作品对后世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不少作品兼顾艺术审美与大众接受度,兼顾专业创作水准与本民族审美习惯,在当时就收获了专业学界与普通听众的双重关注。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开启现代化转型,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思想与文化成果,音乐领域也汇入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洪流。为推动新式音乐文化发展、研习专业音乐理论知识,大批青年学子远赴欧美、日本等国学习音乐。

以萧友梅、赵元任为代表的音乐家学成归来后,恰逢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彼时,中国传统音乐虽底蕴深厚、根基稳固,伴随着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拓展,社会也产生了对新型音乐艺术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追求思想解放,为中国新式音乐的萌芽与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思想环境。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渴望通过音乐等艺术形式来传递新的思想观念,由此催生了对现代音乐作品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近代教育领域的改革也为音乐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新式学堂陆续兴办,音乐教育被正式纳入新式教育体系。当时近代音乐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亟待专业音乐人才支撑。萧友梅、赵元任等音乐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投身音乐教育事业。萧友梅先后创办了多所音乐院校,他深知音乐教育对于培养音乐人才和传播音乐文化的重要性,他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融合,创作出《问》等一系列兼具开创性与时代特质的声乐作品。

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众的文娱生活愈发多元。彼时传统民族音乐依旧是大众文娱市场的主流,但音乐会、民间音乐社团等新兴音乐业态逐步萌芽发展。全新的音乐形式为归国音乐人搭建了展示原创作品、传播新式音乐理念的优质载体。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正是在这一时期广泛流传开来。该作品曲调婉转悠扬,融合中西方音乐创作特色,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各类公开音乐演出活动中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该作品歌词兼具文学美感与诗意意境,旋律创作既吸纳了中国民间音乐特色元素,又借鉴了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依托各类公共音乐演出的传播赋能,这首歌曲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也让普通大众首次直观、清晰地认识艺术歌曲这一全新的声乐体裁。常态化的公开音乐展演,打通了音乐创作者与普通听众的沟通壁垒,有效助力新式声乐体裁突破传统局限,逐步走进大众文化视野,成为近代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萧友梅、赵元任的音乐作品研读,对于了解20世纪20年代艺术歌曲的整体风貌而言无疑是一条捷径,其作品呈现出的共性艺术特征,也成为这一时代鲜明的文化印记。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的全部艺术歌曲均可直接为后世所借鉴,也并非所有作品都能够对后续音乐创作产生积极作用。毫无疑问,萧友梅、赵元任二位作曲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他们的精心创作,并且经过了实践和大众检验。他们的作品无疑是理解20年代艺术歌曲整体风格的一条路径,而这些作品所凸显出的共同艺术特征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烙印。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我国艺术歌曲在旋律、结构上的探索,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缩影。这种多元融合极大丰富了艺术歌曲的艺术内涵与表现形式,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音乐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筑牢根基,为后世音乐创作留下宝贵的实践经验,启发后世创作者立足本民族文化沃土开展创作实践,是民族音乐传承创新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成果。

(作者系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讲师)

水利遗产活化利用与文旅价值转化的协同创新

马 盈 巫程成 郑 明

水利遗产是工程遗存、治水文化与滨水生态的复合体,兼具实证性、叙事性与景观性。杭州余杭苕溪流域拥有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近年来,余杭探索出一条水利遗产活化利用与文旅价值转化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其路径遵循价值重构、功能重塑、机制协同三个递进环节:价值重构回答为何转化、功能重塑回答为谁转化、机制协同回答如何转化。

价值重构:从防洪屏障到文化资产的逻辑转向

在传统观念中,堤塘堰坝只是服务于防洪排涝的工程载体,人们关注的是断面宽度和泄洪能力,文化属性往往被其工程属性所遮蔽,堤岸上的碑刻、古闸与治水故事无人问津。依据世界遗产普遍价值理论,遗产价值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指标,而是科技、历史、审美与社会认同的多维集合,一项水利工程能成为遗产,正因它同时承载工程技术史与地方集体记忆。苕溪水利遗产活化利用兼顾了工程属性和文化属性,既守住防洪底线,又把堤岸上的诗词、古闸、渡口转化为可阅读、可讲述的文化内容,使工程本身成为文化叙事的载体。

一是考古学意义上的遗产价值。2015年确认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将中国水利史的开端前移至距今约5000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随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考古学界认为,在世界古文明中古城并不鲜见,良渚水利系统所展现的规划水平、工程规模与系统完整性,在同时期遗存中较为罕见。苕溪流域作为这一世界级水利遗产的承载地之一,具有国际文化传播价值。二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文明价值。苕溪流域治水先贤代相赓续:东汉陈浑“发民十万”筑南湖以分杀水势,唐代归珧疏浚两湖积劳殉职,北宋杨时力阻权臣侵占南湖。通济桥的历史源头可追溯至东汉熹平四年陈浑所建隆兴桥,现存石桥的溢洪券洞设计,暗含朴素的流域系统调度治水智慧。这些历史典故都具有转化为研学课程、文艺创作与景观叙事的文化开发价值。三是当代意义上的实践价值。以用促保、以保促用,构成水利遗产活化利用区别于单纯遗址保护的价值根基。陈浑所辟南湖今天仍是东苕溪流域滞洪区,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过境,瓶窑站洪峰水位超过历史最高纪录,西险大塘安然行洪,实证了五千年治水经验可以延续至当下。

功能重塑:从工程堤防到主客共享的服务集成

价值只有进入空间才能被确认,一处遗址,如果人不能走近、不能停留,它的文化意义就始终停留在图纸和档案里。主客共享理念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在空间上复合、功能上互嵌、供给上协同,让同一处驿站既能为村民提供休闲和阅读,也能为游客提供咨询和导览。

第一,游憩功能要完成价值转化,空间开放与设施可达缺一不可,可达性因此成为其公共属性的第一要件。余杭以西险大塘这道长堤为骨架,针对停车、休憩、运动等民生痛点,配置贯通绿道、便民驿站与生态滩地,休闲旅游功能由此贯通。设施一次投入、主客共用,旅游服务进入市民日常,市民常用的设施对游客同样敞开。第二,可进入的空间,还需可读的文化;水利遗产经符号转译形成叙事,这正是文化功能的要义。余杭沿堤营建百里诗堤与苕溪文化馆等水文化地标,承载诗词、治水史与水情教育;宣杭拾忆铁路公园、北湖草荡湿地则延续在地文脉,让工业遗存与古滞洪区进入当代生活。第三,功能的供给应以主客共享为标尺,设施、阅读、资源三类配置各有侧重。设施配置方面,驿站兼容游客咨询与村民休憩,绿道串起停车、运动等民生设施;资源分配均等方面,把建设重心放在滨水乡村地带,让红利沿堤线向乡村扩散。三类做法指向同一目标,均等化保证红利不被少数点位独占,主客共享由理念落地为制度安排。

机制协同:水利遗产价值活化的长效路径

水利遗产活化利用涉及水利、文旅、生态环保等多部门和属地镇街,职能交叉、理念冲突、协同困难在所难免。水利遗产活化协同治理的要义,在于推动政府部门、社区、企业与公众从分工走向合作,把责任边界和收益分配写进制度,使公共价值在制度化的互动结构中持续产出。

一是安全为本与利用为要的统筹协同。水利遗产活化利用统筹协同的核心在于以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处理安全约束与价值利用的辩证关系,构建“底线保障—战略嵌入—数字赋能—价值复合”的协同路径。如余杭通过达标加固筑牢底线,再叠加良渚文化大走廊战略统筹,系统推进风情带建设;同时西险大塘布设智能监测点位,实时感知堤防运行状态。二是保护与发展的空间协同。水利遗产活化利用保护区域因文化资源禀赋而获得保护地位,但也可能因此限制了生产性开发,若无补偿机制,保护的正当性便难以为继。余杭创新“文保飞地”模式,14个经济薄弱村在保护区外共建发展大厦,由产业平台、区属国企和镇街村共同出资,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空间置换化解机会成本,以文化赋能反哺遗产保护,让遗产价值经市场机制回流保护主体,实现遗产保护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三是多元主体的治理协同。从公共价值理论视角出发,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取决于多元主体的参与深度。在地方实践中,政府主导工程规划与制度供给,市场主体运营沿线业态,社会组织参与文化供给。各主体各安其位,形成可持续的价值共创生态,这正是协同创新区别于一般项目制建设的深层逻辑。

苕溪水利遗产活化利用与文旅价值转化的协同创新,本质上是安全、文化、服务与市场四重逻辑的内在统一:价值重构让五千年治水史从“沉睡”走向“苏醒”,功能重塑让防洪设施从钢铁屏障转化为主客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机制协同让价值由单维建设走向多元主体持续共创。从工程水利到文化水利再到共富水利,苕溪的实践表明,推动大河安澜与文旅富民同频共振,水利遗产便能在活化利用中持续释放文化价值与社会效能。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本文系2026年余杭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委托课题“苕溪文化风情带建设的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Yhsk26W04)阶段性成果]

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医药科普创新路径探析

张 雷 谢 超

随着大数据、算法推荐、多模态交互等数字技术全面渗透信息传播领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掀起传播变革,重塑了公众的知识获取方式、文化认知形成与健康学习的行为模式。传统固化的单向知识灌输模式正逐步被打破,公众的知识接收方式从被动接收、主动查阅,升级为智能推送、场景适配、个性化交互的全新模式。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与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医药科普传播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现实挑战。

中医药科普传播的发展现状

(一)传播形式相对单一。当前中医药科普主要依托线下讲座、纸质读物、固定宣传展板等传统渠道开展,传播形式不够丰富;同时中医辨证施治、整体观念、治未病等核心理论专业性较强,普通大众对其认知与理解门槛较高,目前尚难以形成广泛的传播共鸣。

(二)内容同质化程度高。目前,网络中医药科普内容存在碎片化、同质化、娱乐化等倾向,存在对中医药知识片面化解读等问题。整体来看,权威规范、体系完整、逻辑严谨的高品质中医药科普内容供给存在缺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医药科普的高质量发展。

(三)受众需求精准匹配程度不足。不同年龄、健康状况、认知层次的群体,对中医药健康知识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青少年侧重中医药文化认知与趣味科普,中老年群体侧重养生保健、慢性病调理知识,慢性病患者更关注辨证施治、科学康养等专业内容。但当前尚无法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推送适配内容。

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科普发展路径

(一)夯实数字底座,实现多渠道联动推广。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中医药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海量中医药古籍文献、经典方剂、临床诊疗案例、中药材辨识知识等优质资源完成数字化归档,搭建起标准化、结构化、规范化的中医药知识库,为人工智能模型开展算法训练、知识拆解、内容生成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撑。同时,国内各中医药医疗机构、科研院校、科普平台持续推进智慧化转型,逐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数字中医药展馆、智能科普终端等多元载体,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科普传播新格局,打破传统科普受时空限制的壁垒,为中医药科普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二)依托技术叠加,构建智能化科普体系。多模态人工智能、智能语义分析、虚拟数字人交互、人工智能可视化建模等技术的落地与广泛应用,为中医药科普创新发展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相较于传统人工编撰、单向输出、静态传播的科普模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中医药知识的系统化拆解、专业化通俗转译与精准化定向推送。比如,国内中医药院校与医疗机构可探索构建中医药人工智能科普模型,通过整合多源异构中医药数据资源,实现科普内容智能生成、受众需求精准匹配、科普效果动态监测与复盘的全流程智能化服务。相关实践不仅可以积累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中医药科普领域的落地经验,更为中医药科普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现代化模式的系统性转型筑牢了资源、技术与实践根基。

(三)精准识别需求,优化科普内容供给。依托大数据,可对公众搜索行为、阅读偏好、健康咨询热点、科普互动数据等进行有效采集与智能研判,精准挖掘不同年龄、职业、健康状况群体的中医药知识需求,明确不同群体对中医养生、药材鉴别、慢性病调理、节气养生等内容的关注重点。基于用户需求画像,可推动科普内容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比如,针对青少年群体,聚焦中医药文化普及,开展趣味化、轻量化科普;针对中老年群体,聚焦日常养生、慢性病调理,开展实用性、适配性科普;针对普通大众,聚焦日常防病、药材辨识、认知纠偏,开展普惠性、规范性科普。同时,借助AI知识图谱技术,可对晦涩难懂的中医药经典理论、辩证逻辑、方剂配伍原理进行结构化拆解与通俗化重构,提升中医药科普的实用价值与传播效能。

(四)创新交互形态,丰富科普传播场景。传统中医药科普以文字、静态图片为核心传播载体,受众体验感弱。人工智能多模态技术通过动画建模、虚拟数字人讲解、人工智能诊断模拟、沉浸式场景交互等多元技术手段,将抽象的中医经络运行、穴位原理、辨证施治、药材炮制等专业知识,转化为可视化、动态化、趣味化的内容形态。依托人工智能短视频生成技术,可快速制作标准化、轻量化的中医药科普短视频、图文海报,精准适配抖音、微信、视频号等传播场景;通过虚拟数字人直播、智能语音答疑、线上沉浸式中医药体验馆等形式,搭建双向互动式科普场景,让公众在互动体验中完成对中医药知识的理解吸收。

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医药科普的价值坚守

人工智能为中医药科普创新赋能增效,但技术仅仅是服务科普的工具,绝非主导科普的核心,必须坚守专业初心与文化底线,规避算法偏见、内容失真、过度娱乐化等行业乱象。对此,需构建人机协同、以人为主、以技为辅的常态化科普工作机制,明确人机分工、强化协同赋能。

具体而言,一是人工智能主要承担数据采集分析、科普内容初步生成、全域传播分发、传播效果动态监测等辅助性工作,有效提升科普工作效率;二是由中医药专业医师、科研人员与科普从业者全权负责内容审核、知识校准、文化深度解读与价值正向引导,保证科普内容的专业性、规范性与权威性;三是建立人工智能科普内容多级审核校验机制,依托专业团队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逐一对标、纠错校准,坚决杜绝伪科学、片面化内容传播;四是通过算法优化升级,打破平台同质化内容推送闭环,构建多元、优质、权威的中医药科普传播生态。在技术赋能的前提下深耕中医药文化内核,兼顾大众知识科普与传统文化传承,以此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在数字时代持续绽放生机与活力。

(张雷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科研处;谢超单位:南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